

中国通史故事全编

专制集权的进一步强化：
明代历史故事

（之五）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通史故事/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2. 1

ISBN 7 - 225 - 02048 - X

I . 中... II . 北... III . 历史故事—中国—先秦—近代
IV . 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3153 号

中国通史故事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出 版 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印 刷 北京密云胶印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240

字 数 600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 - 225 - 02048 - X/K · 148

定 价 600.00 元(全 60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 目 录 ☆

明代的假特务	(1)
东林党之争	(6)
“ 都人之子 ”与“ 金合之约 ”	(19)
前后妖书之案	(25)
挺击太子案	(28)
红丸案	(34)
移宫案	(39)
阉党专政	(45)
宁夏之乱	(51)
杨应龙之反	(55)
矿税之害	(58)
李时珍和《本草纲目》	(61)
徐光启和《农政全书》	(67)
徐霞客及其《游记》	(73)
宋应星和《天工开物》	(79)
心学大师王阳明	(83)
离经叛道的李贽	(91)
泰州学派	(108)
嘉靖崇道教	(111)
前后七子	(115)

◇ 明代的假特务 ◇

明代侦缉特务既然这样繁多，散布各地，可以随意指派人民罪名，刮榨财物，同时他们势焰熏天，行动诡秘，谁也不敢向他们要证据，或是问询他们的身份。于是流氓无赖趁机出动，冒充特务，或挟仇诬陷害，或敲诈财物，真特务已经把老百姓弄得倾家荡产，叫苦连天。再加上这批假特务，就真正把老百姓弄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了！

在明代假特务的出现是在朱祁镇时代，那时特务头子逮杲、门达相继用事，在杲时便有——

四方奸民诈称校尉，乘传纵横，无所忌。^①

在门达时又有这类事件发生，但发现以后假特务竟然逍遥法外。

湖广诸生马云罢黜，诈称锦衣镇抚，奉命葬亲，布政使孙毓等八人咸赙祭。事觉，法司请逮问，卒不罪云。^②

朱见深时竟有人冒充特务头子汪直，而且呼朋引类，从芜湖、苏、杭直到宁波，撞骗了好几省地方。事情发生在成

① 《明史·门达传》卷三〇七。

② 同上。

化十三年——

江西人杨福，诈称太监汪直，事觉，问拟斩罪。福尝奴事崇内使，随入京，而背之。还过南京，遇所识者，谓其貌似直。福乃诈称为直，而所识者伪为校尉。先导自芜湖县，乘传食禀。历常、苏，由杭州、绍兴、宁波诸府，有司皆承奉恐后，市舶司内官亦信而畏之。官民多持词讼往诉，或为之理。至台、温、处州、及建宁、延平，皆操盘粮以张威。所过虽假廉以取信，然为伪校尉所得者已多。及抵福州，称有敕旨，自三司官以下，迎候惟谨。小官忤意，即仗之。竟以无符验为镇守太监卢胜等所察知，执问如律，时直势振天下，故小人乘之以扰害人如此。^①

朱祐樞时有假特务逮捕人的事发生。

宏治十八年，南京御史李熙等奏：“迺者小人徐俊、程真，妄造谣言贴子，特给驾帖，密差锦衣官校至南京缉拿所指王升，远近震惊。然兵部无此官，亦无此事。官校轰然而来，寂然而返。后日奸人效尤，又不但如所指而已。”刑部覆奏：“驾贴之出，殊骇听闻，奸人伪造，为害尤大。”^②

① 《弇山堂别集·中官考三》卷九十九。

② 《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驾贴之伪〕。

朱厚照时也有诈称访事的：

有锦衣卫百户沈彬者，因贿杨玉入东司房办事，往往诈称访事，煽惑人心，以张瑾威。^①

朱厚熜时，竟有强盗冒充特务，到县衙门内捆辱知县，诈取帑金的事。

张佳胤……嘉靖二十九年进士。知滑县。剧盗高章者，诈为缇骑，直入官署，劫佳胤索帑金。佳胤色不变，伪书券贷金，悉署微名，召入立擒贼。^②

那时冒充特务的人大概很多，以致外省官吏把真特务当作假特务看待。

嘉靖四年的锦衣官校侦事广东，（副使孙）懋与按察使张祐疑其伪，执之。事闻，逮下诏狱^③

朱翊钧中年矿税特务，遍于天下，其时冒充特务税监或是参随的事，曾一再发生。

时税使四出，海内骚然。

① 《弇山堂别集·中官考六》卷九十九。

② 《明知·张佳胤传》卷二二二。

③ 《明史·孙懋传》卷二〇三。

二十六年冬，奸民张礼等伪为官吏，群小百数十人分据近畿要地，税民间杂物，弗予，捶至死。^①

二十九年九月，山西巡按赵文炳言……大奸丁文灿、马三聘等假称参随，所至吓骗。^②

至于诈取一般老百姓财物的事就更多，而且越到后来越严重，崇祯四年给事中许国荣曾痛切陈奏，并举出许多实例，他说：

今日肆毒无忌者，不尽在真厂卫，而在假充厂卫之人。盖以厂卫二字为破胆之霹雳，而奸棍恶少遂假以为吓诈装头。敢就所闻。错陈其概：如绸商刘文斗行货到京，奸棍赵瞎子口称厂卫，捏指漏税，密擒于崇文门东小桥庙内，因搜其底帐，载有辅户罗绍所李思怀等十余家，并行拿拷，共诈银二千余两矣。长子县教官推升县令，忽有数棍拥入其寓内，口称厂卫，指为营干得来，许银五百两矣。菜市口鱼行酒馆遵禁罢肆，忽有奸棍刘科等口称厂卫，排其户指有宿酝鱼腥，各诈钱数十贯矣。山西解官买办黑铅，照数交足，众棍窥有余剩，在潞绸铺内口称厂卫，指克官物，捉夺王舖等四家，各诈银千余两矣。苏州顾监生挟数百金为加纳资，众棍窥其愚稚可啖，口称厂卫拿人，罄劫其资，一哄散

① 《明史·傅好礼好》卷二三七。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三。

矣。医士杨四置买纱绢，众棍疑有积蓄，口称厂卫，因告行提，销禁碾儿胡同，席卷其橐而后释放矣。此犹肆诈于城市者也。风闻蓟门孔道，假侦边庭，往来如织。如玉田马户项福等，先经有四棍假称厂卫索骑于前，未几而踵至索骑者复有多人，一日之内，两被驿骚，穷诘之，始知赆鼎。则其假诈边方，未经败露者不知几何人矣。凡此特千百中之一二也。至于散在各衙门者，藉口密探，故露踪迹，纪言纪事，笔底可操祸福，书吏畏其播弄风波，不得不醵金阴饵之，遂相沿为例而莫可问矣。总之，真厂卫之坏事，厂卫之臣得而惩之。唯疑真疑假，触处设阱，被害者吞声饮恨，而举朝又畏言发祸随，姑俟其自败。臣拚死为皇陈其大略，伏乞敕下该衙门益加严毖，此后敢有假冒，务置诸法。^①

但这以后假特务仍是横行无忌，如崇祯十五年御史杨仁愿上言云：

臣待罪南城，所阅词讼，多以假番故诉冤。^②

由以上这些事实，可见当时假特务也是遍于全国，无地无之。而且这些事实不过是“千百中之一二”，则人民所遭受到的祸害灾殃也不知悲惨到怎样程度。一个统治者腐化恶

① 《春明梦余录》卷六十三。

② 《明史·刑法志三》。

化到这样地步，纵使人民被屠杀镇压得怎样驯良，也不得不奋起推翻这个政府了。

◇东林党之争◇

东林党之争是明朝末年历史上的一个特征。

首先应该明确这样一个问题，历史上所谓党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党是两回事，不能把历史上所说的党和今天的政党混同起来。历史上所说的党并没有什么组织形式，参加哪个党是没有任何形式的，既不要交党费，也没有组织生活，更没有党章和党纲。然而在历史上又确实叫作党。历史上所谓党是指的什么呢？是指政治见解大体相同的一些人的集团，也就是统治阶段内部某些人无形的组合。明朝的东林党，它的情况大致是这样：在江苏无锡有个书院叫东林书院，这是一所学校。当时有两个政府官员，叫顾宪成和顾允成两兄弟，在北京做官的时候，由于他们在政治见解与当时的当权人物相抵触，便辞官不做，回家后在东林书院讲学。他们很有学问，在地方上声望很高，为人也正派。这样，和他们意气相投的人跟他们的来往便越来越多了。不但在地方上，就是在北京，有一些官员跟他们的来往也比较多。他们以讲学为名，发表一些议论朝政的意见。这样，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一五九四年）开始，一直到明朝被推翻，前后五十年间，在明朝政治上形成了一批所谓东林党人，和另外一批反对东林党的非东林党人。非东林党人后来形成齐（山东）、楚（湖北）、浙（浙江）三派，与东林党争论不休。这五十年中间，在几件大事情上都有争论。你主张这样，他反对；

他主张那样，你反对。举例来说，党争中最早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京察”问题。“京察”这两个字大家都认识，但是不好懂。这是古代历史上的一种制度，就是政府的官员经过一定的时期要考核，相当于现在的考勤考绩。主持考勤考绩的是吏部尚书、吏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内务部长、副部长），他们主管文官的登记、资格审查、成绩考核及任免、升降、转调、俸给、奖恤等事。当时考取进士以后，有一部分进士就安排做科道官。科就是六科给事中，道就是十三道御史。六科就是按照六部（吏、户、礼、兵、刑、工）来分的。道是按照行政区划来设置的。当时全国有十三个布政使司，设了十三道御史，譬如浙江道有浙江道御史。科道官都是监察官，当时叫作“言官”。他们本身没有什么工作，只是监察别人的工作，提出赞成的或者反对的意见。他们的任务就是说话，所以叫“言官”。每次“京察”，吏部提出某些人称职，某些不称职。一五九四年举行“京察”的时候，就发生了争论，这一部分人说这些人好，那一部分人说不好。凡是东林党人说好的，非东林党人一定说不好。争论中掺合了封建社会的乡里（同乡）关系。譬如齐、楚、浙就是乡里关系。不管这件事情正确不正确，只要是和我同乡的人，都是对的。还有一种同门的关系。所谓同门就是指同一个老师出身的。不管事情本身怎么样，只要跟我是同学，就都是对的。至于对亲戚、朋友则更不用说了。就在这样的封建关系组合之下，从一五九四年“京察”开始，一直争吵了五十年。

继“京察”问题之后，接着发生了“国本之争”。所谓“国本”就是国家的根本。我们今天说国家的根本就是人民，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概念。那时候

所谓“国本”是指皇帝的继承人问题。万历做了多年皇帝，按照过去的惯例，他应该立一个皇太子，以便他死后有一个法定的继承人。可是他不喜欢他的大儿子，他所喜欢的是他的小老婆（郑贵妃）生的儿子福王（以后封在河南洛阳），所以他就迟迟不立太子。有些大臣就叫起来了，他们认为国家的根本很重要，也就是说第二代的皇帝很重要，应该早立太子。凡是提议立太子的，万历就不高兴，他说：我还活着，你们忙什么！这样，有人主张早立太子，有人反对立太子，争吵起来了，这就叫“国本之争”。

跟着又发生了一个案子叫“挺击案”。有一天早晨，突然有一个人跑到宫里来见人就打，一直打到万历的大儿子那里去了。当然，这个人马上被逮住了。可是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是谁叫他到宫来打万历的大儿子的？当时有人怀疑是郑贵妃指使的。这是宫廷问题，却成了当时政治上的一个大问题，引起了争吵，东林党与非东林党大吵特吵。

万历做了四十八年皇帝，死了。他的大儿子继位不到一个月又死了。怎么死的呢？搞不清楚。据说他在病的时候，有一个医生给他红丸药吃，吃了以后就死了。这样就发生了一个问题，这个皇帝不是被毒死的？是谁把他毒死的？因此又发生了所谓“红丸案”。各个集团之间又争吵起来了。

正在争吵的时候，发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只作了个把月的皇帝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继位，还没成年。这个短命皇帝有个妃子李选侍，她住在正宫里不肯搬出来。她有政治野心：想趁这个小孩作皇帝的机会把持朝政。这样，又发生了争论，有一些人出来骂她：你这个妃子怎么能霸着正宫？逼着她搬出去了。这个案件叫“移宫案”。京戏里有一出戏叫《二进宫》，就是反映这件事的，不过把时代改变

了，把孙子的事情改成了祖父的事情。

“挺击”、“红丸”、“移宫”是当时三大案件，成为当时争论最激烈的事件。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上出现了什么现象呢？每一件事情出来，这批人这样主张，那批人那样主张，争论不休，整天给皇帝写报告。到底谁对谁不对？从现在来看，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之争，一般地说，道理在东林党方面。东林党的道理多，非东林党的道理少。但是，东林党是不是完全对呢？在某些问题上也不完全对。这样争来争去，争不出个是非来，结果只有争论，缺乏行动，许多政治上该办的事没人去管了。后来造成这种现象，某些正派的官员提出他的主张，这个主张一提出来，马上就有一批人来攻击他，他就不能办事，只好请求辞职。皇帝不知道这个人对不对，不作处理，把事情压下来。这个官既不能办事，辞职也辞不成，怎么办？干脆自己回家。他回家以后政府也不管，结果这个官就空着没人做。到万历后期政治纪律松懈到这样的地步：哪个官受了攻击就把官丢了回家，以至六部的很多部长都没人做了。万历皇帝到晚年根本不接见臣下，差不多一、二十年不跟大臣见面，把自己关在宫廷里，什么事情也不管。大臣们有什么事情要跟他商量也见不着。政治腐化，纪律松懈，很多重要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却专搞无原则的纠纷。大是大非没人管了，成天纠缠有一些枝节问题上。

这种无休止的争吵影响到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的发展。譬如日本侵略朝鲜，中国到底应不应该援助朝鲜，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后来还是派兵去支援了朝鲜，第一个时期打了胜仗，收复了平壤。后来又派兵去，由于麻痹大意，打了败仗。打了败仗以后，政府里又发生争论了，主和派觉得

和日本打仗没有必要，支援朝鲜意义不大，不如放弃军事办法，转而采取政治办法来解决问题。他们主张把丰臣秀吉封为日本国王，并答应和他作买卖。历史上封王叫做朝，做买卖叫做贡，所谓朝贡，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你带些物资来卖给我，我给你一些物资作交换。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政府只好一面按照主战派的主张，继续派兵援助朝鲜，一面派人暗中往来日本进行和议。后来明军与朝鲜军大败日本侵略军。日本愿和了。明朝政府便按照主和派撤兵议和的主张，允许议和。并派人到日本去办外交，封丰臣秀吉为国王。但日本国内本来已经有天皇，因此丰臣秀吉不接受王位，而且提出了很强硬的条件。结果外交失败了。日军重新侵略朝鲜。明朝政府只好再次出兵，最后打败了日军。由于追究外交失败的责任，又引起了争论。

这种影响在“封疆案”的问题上表现得更加明显。万历死后，东林党在政府做官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时北京有一个“首善书院”（在北京宣武门内），在这里讲学的也是东林党人。这些人在政治上提出意见时，非东林党人就起来攻击，要封闭这个书院。东林党人当然反对封闭。这样吵了二、三十年。这个争论最后演变成什么局面呢？当时万历皇帝的孙子熹宗（年号天启，是崇祯皇帝的哥哥，很年轻，不懂事光贪玩。他宠信太监魏忠贤，军事、政治各个方面都是太监当家。一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由于在魏忠贤门奔走而当了官。凡是属于魏忠贤这一派的，历史上称为“阉党”。阉党里面没有什么正派人。东林党是反对阉党的。因此，党争发展到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与宦官的斗争。这个斗争影响到东北的军事形势。在万历以前，东北的建州族已经壮大起来了，不断进攻辽东，占领了

许多城市。到天启时代，明朝防御建州的军事将领熊廷弼提出一系列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主张，他认为跟建州进行军事斗争时，明朝军队不能退回到山海关以内，而应该在山海关以东建立军事据点。当时前方的另一个军事将领叫王化贞，他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认为只能依靠山海关来据守。熊廷弼虽然是统帅，地位比王化贞高，但是没有军事实权。而王化贞得到了魏忠贤的支持。这样，熊廷弼的正确意见因为得不到支持而不能贯彻，结果打了败仗，王化贞跑回来了，熊廷弼也跑回来了，山海关以东的很多地方都丢了。北京震动，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又发生了有关“封疆案”的争论。当时追究这次失败的责任，到底是熊廷弼的责任，还是王化贞的责任？从当时的具体军事形势来看，熊廷弼是正确的，但他没有军队来支持。王化贞有十几万军队，坚持错误的主张，因此王化贞应该负责。但是因为熊廷弼得罪了很多人的，结果把这个责任推到他身上，把他杀了。很显然，这样的争论和处理大大地影响了前方的军事形势。

“封疆案”以后，跟着就是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屠杀。因为一些在朝的东林党人认为魏忠贤这样胡搞不行，就向皇帝写信控告他的罪恶。当时有杨涟等人列举了他的二十四条罪状。这些东林党的行为得到了其他官员的支持。这样，东林党和阉党就面对面地斗争起来。由于魏忠贤军权在握，又指挥了特务，而东林党人缺乏这两样武器，结果大批的东林党人被杀。当时被杀的有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黄尊素、缪昌期等。其中周顺昌在苏州很有声望，当特务逮捕他的时候，苏州的老百姓起来保护他。最后这次人民的斗争还是失败了，人民吃了苦头，周顺昌被带到北京杀害了。

熹宗死了以后，明朝最后的一个皇帝——崇祯皇帝比他

哥哥清楚一点，他把魏忠贤这伙人收拾了，把一些阉党分子都杀了（魏忠贤是自己上吊死的）。但是这场斗争是不是停止了呢？没有停止，东林党人跟魏忠贤的余孽在崇祯十七年的时候还在继续斗争。崇祯五年（公元一六三二年）一些东林党人的后代跟与东林党有关系的地方上的知识分子组织了一个团体，叫作“复社”，以后又有“几社”，有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参加。表面上他们是以文会友，写文章、写诗，是学术研究组织，实际上有政治内容。大家可能看过《桃花扇》这出戏，这出戏里的侯朝宗、陈贞慧、吴应箕、冒辟疆四公子都是复社里面的人。当时李自成已经占领了北京，崇祯上吊死了。这个消息传到了南方，没有皇帝怎么办？这时一些阉党人物就想拥小福王（由崧）来作皇帝。原来万历把最喜欢的那个儿子福王（常洵）封在河南洛阳，这是老福王。这个人很坏，在他封到洛阳时，万历给他四万顷土地，河南的土地不够，还把领省的土地也给他。老百姓都恨透了。李自成进入洛阳以后，把老福王杀掉了。小福王由崧（这也不是个好东西）逃到南京。当时在南京掌握军事事实权的是过去和魏忠贤有关系的阉党人物马士英，替他出主意的也是一个阉党分子，叫阮大铖，他们把小福王抓到手中，把他捧出来做皇帝。可是政府里面另外一批比较正派的人，像史可法、高弘图、姜日广等主张立潞王（常潞）做皇帝。这个人比较明白清楚。但马士英他们先进了一步，硬把福王捧出来做了皇帝。这样，在南京小朝廷里发生了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之争。因为马士英和阮大铖是当权的，史可法被排挤出去，去镇守扬州。在清军南下的时候，史可法坚决抵抗，在扬州牺牲了。马士英和阮大铖在南京搞得不像样，清军一步步逼近南京。这时候小福王在做什么呢？在跟阮大

铖排戏。也就在这个时候，上面说的四公子就起来反对阮大铖，他们出布告，揭露阮大铖过去是魏忠贤的干儿子，名誉很不好，做了很多坏事，不能让他在政府里当权。号召大家起来反对他。南京国子监的学生也支持他们的主张，这样就形成一个学生运动。侯朝宗这些人虽然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支持，但是他们根本没有实力。而马士英、阮大铖有军事力量。结果有的人被逮捕了，有的人跑掉了。不久之后，清军占领南京，小福王的政权也就被消灭了。

党争从一五九四年开始，一直到一六四五年，始终没有停止过。无论是在政治问题上，还是在军事问题上，都争论不休。这种争论是什么性质的呢？这是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开始是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由于东林党的主张在某些方面是有利于当时的生产的发展的，因此他们得到了人民支持。但是反过来说，所有的东林党人都反对农民起义。这是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的，譬如史可法这个历史人物，从他最后这段历史来说是应该肯定的。那时候，清军南下包围扬州，他的军事力量很薄弱，也得不到南京的支持，孤军据守扬州。但他宁肯牺牲不肯投降。这是有民族气节的人，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有骨气。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史可法就是这种有骨气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以前的历史就不好追究了。他以前干什么呢？镇压农民起义。在阶级斗争极为尖锐的时候，这些人的阶级立场是极为清楚的，反对农民起义，镇压农民起义。即使在他抗拒清军南下的时候，还要反对农民起义。有没有同情农民起义呢？没有。不可能要求统治者来同情被统治者的反抗。

对于这样一段党争的历史，要具体分析，具体研究。党

争跟明朝的政治制度有关系。明太祖在洪武十三年取消了宰相，取消了中书省，搞了几个机要秘书到内廷来办事情。到明成祖时搞了个内阁，这是个政府机构。内阁的权力越来越大，代替了过去的宰相，虽然没有宰相之名，但是有宰相之实。至于给皇帝个人办事的有秘书，就是在宫廷里面设立一个机构，叫作“司礼监”。这是一个内廷机构，不是政府机构。司礼监有一个秉笔太监，皇帝要看什么政府报告，让秉笔太监先看；皇帝要下什么书面指示，也让秉笔太监起稿。皇帝年纪大一些，知识多一些的，还能辨别是非，是不是同意，他自己有主见。可是一些年轻的皇帝就搞不清楚，结果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就操纵政治，掌握了政权。因为用人和行政的权力都给了司礼监，结果形成了明朝后期的太监独裁。在明朝历史上有很多坏太监，像明英宗时代的王振，明武宗的刘瑾，天启时代的魏忠贤等。太监当家的结果，就造成了政府与内廷之争，也就是统治阶级内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与太监争夺政权的斗争。明朝后期五十年的东林党之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进行的。

随着太监权力的扩大，不但中央被他们控制了，地方也被他们控制了。洪武十三年以后，地方上设有三司（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三司是各自独立的，都受皇帝的直接指挥。到了永乐时代，当一个地区发生了军事行动，像农民起义或其他的群众斗争爆发的时候，这三个司往往意见不统一，各管各的。结果只好由中央政府派官员去管理这个地方的事。这个官叫巡抚，巡抚是政府官员，常常是由国防部副部长，即兵部侍郎担任。巡抚出去巡视各个地方，事情完了就回来。可是由于到处发生农民战争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战争，这个官去了以后就回不来了，逐渐变成一